

「不」的发现

『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

张先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先飞 著

『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

「人」的发现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张先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8241-7

I. 人… II. 张… III. 新文学运动(五四)-人道主义-研究

IV. I209 B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308 号

“人”的发现

RENDE FAXIAN

——“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

张先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6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241-7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一

张先飞的这部《“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六年前我参加了这篇博士论文的答辩。后来，他获得教育部资助，赴日本东京大学，在尾崎文昭教授指导下进行研修工作。或在日本，或归国后，他以此课题为中心，搜寻大量日文或中文的学术资料，广泛阅读了那个时期里中国学术界的相关介绍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这一课题的思路，从论文题目、理论框架至阐述内容各方面，对原论文作了较大的调整、修改、深化。付梓前，张先飞将清样电子文本发给我，邀为作序。我于此论题，所涉甚浅，书中理论阐发及引述史料，与原论文较之，已完全是另一番面貌，读后颇有陌生之感。写序恐言不及义，但盛情难却，忐忑中只能写一点隔靴搔痒的阅读感受了。

关于周作人等作家倡导传播的“五四”文学人道主义思潮问题的研究，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传入及评价，就周作人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阐说，都有了丰富成果产生。要在这个学术起点很高，并非完全新鲜的话题中，拓展出新的学术阐释空间，作出富有新异创见和深厚历史感的言说，以苦涩艰辛垦殖出一片有昂然绿意的“自己的园地”来，是一件十分艰难，甚至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这部学术著作匆匆读过一遍之后，给我一个总的感

觉,就是作者为这个棘手课题所付出的劳动,所收获的,不是重炒冷饭的“精神浪费”,而是虽并不硕大,却尚可给人咀嚼,让人耐心品味的一份果实。

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的拓荒性质的“新”,而在于它“开掘”性质的“深”。作者所努力的,也不是刻意提炼升华出一个什么震聳一时的思想或理论命题,而是努力走进原生历史处境,复原历史面貌的历史性的深度追寻。为了弄清周作人“五四”时期倡导的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内涵,以及它的生成发展过程与吸收转化西方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间的源流关系,论著倾注不少心力,属意于对三个方面的史料资源和理论背景的开掘与论述。一个是,来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开创的俄罗斯文学中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及其后续脉系的诸多文学家与周作人思想起源和发展之间的细微的联系;一个是,周作人对于留学时代已十分熟悉并与他们联系密切,有感同身受般认知的“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以及其他如坪内逍遙、志贺直哉等二十世纪初旬日本作家、评论家的相关文学思想的吸收消化;第三是,在上述两个源头影响之下,秉承现代人道主义精神进行文学创造和理论阐释的许多“五四”新文学家们的积极思想成果,这里包括鲁迅、沈雁冰、郑振铎、张闻天、沈泽民等文学研究会系统的作家、理论家,以及《新青年》及其他脉系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郭沫若、田汉等作家。在这部论著中,这些中外作家、理论家的文学创作、译介和批评思想,成为论述以周作为核心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核心内涵本体,或重要的背景参照。作者通过周作人“人的发现”这个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核心的思想,将现代西方文学、“白桦”及“新村”为核心的日本文学、以《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构成了

一个密切关联而又发展影响脉络清晰的思想网络,在较为阔大的视野和更加潜入的理论深度上,通过层层递进的考察、分析、论述,给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这一富有东方色彩的文学思想的生成、发展、特色、思考深度及其价值意义、内在矛盾和思想转折,作出了带有对同一理论思考“再出发”性质的历史回眸与理论阐释。

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这个课题本身,带有浓厚的西方及日本文学思潮影响研究的成分和色彩。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品质极为重要。阅读这部著作,我很注意他对于同类性质课题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和实践。从许多论述文字中、大量引述的资讯中、思维逻辑的展开中,我了解的不仅是他那些论述的观点与结论,更明显感到他对于一种方法论的追求:既要有一种很强烈的影响研究必须的历史意识,但又特别警惕自己的研究,如何具有不被预设理论、框架模式和浮面比附所“遮蔽”的“严肃性与历史品格”。谈及本书进入西方影响问题探讨研究的方法论时,从作者所提供的思考,可以看出他自己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自觉:“为了恢复新文学西方渊源研究应具备的严肃性与历史品格,著者以为,目前研究者们所要做到的,首先是‘悬搁’各种预设的话语系统与它们所搭建起的历史框架,以及现有的部分研究结论;之后再重新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进行历史还原,并将其作为一切研究工作的起点与基础”。他又说:“回到历史‘现场’,还应还原历史‘现场’中所使用的历史解释系统、文明解释系统,以及各种理论命题与思考框架。在文学史研究中这些解释系统、命题、思考框架与‘现场’的历史文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分析这些历史文献最为适宜的理论工具,实际上,如果不用‘现场’中的解释系统、认识框架来解读,这些历史文本的含义是无法准确理解的”。

作者这种方法论意识的清醒和努力,使他对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俄国及日本文学思潮关系的研究,避免了浅层联系简单比附的弊病,而达到了更富历史感与思想深度的探讨。对于被周作人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新福音”的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与以往各种形态人道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他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与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的真理的发现、“人间的自觉”的理论勃兴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他自身认知的清醒与自觉,如何从中获取核心性精神作为自身理论发展的基础,但却又扬弃了一些与时代前行不相符合的“教义”,而显出随着时代进展思考中新的亮色,也就非常清楚地被呈现出来了。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在《新文学的要求》中他又提到“人间的自觉,还是近来的事,所以人性的文学也是百年内才见发达,到了现代可算是兴盛了”。本书作者基于在较为开阔视野之下进行的历史把握和科学分析,对于周作人思想的意义价值和存在的诸多弱点局限,对于周作人作为“五四”前期社会改造热潮当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既重视理论的介绍与思考,也强调新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实践的关系,成为“五四”前期重要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后来又怎样放弃社会实践,远离现实关注而发生走向自我完成的逆转,也就可能分析把握得更为清晰了。

本书论述了周作人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它本身的丰富内涵与精芜杂糅结合的复杂性,他倡言的“人间性”与“大人类主义”的空想色彩,是探讨中需谨慎正视的问题。1924年后,周作人对于文学能够沟通人们心灵、“发皇”国人

精神的功用,以及认为可以利用科学对国人进行思想、道德启蒙的信念的否定,最终放弃社会改造的理论信念与实践关注,放弃为人类的理想和热情,并在致鲁迅信中申言:“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周作人很快把自己思想中社会改造的理想成分——“人间本位主义”排斥出自己精神世界,使得这样超越性的精神,只剩下了个人主义的部分。社会改造的理想不复存在,于是周作人把目光转向其基于个人主义立场的求胜意志,以充分发展求胜意志,来丰富他内面的精神世界。周作人把在精神世界“自己的园地”中占有很大位置的一些有益于普遍社会人生的观念排斥了出去。20年代末,周作人更在文章中明显表达自己思想的蜕变。30年代倡言的“闲适”生活态度,主张的文学“无用论”,对趣味性灵的推崇等,都应是周作人在20年代前期已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的展开和落实。这本书中论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的衍变过程,同时,他的这些早期人道主义思想蕴含的空想性、虚幻性,后来精神自娱的“闲适”文学观的局限,由“文学的革命”走向附逆后的“文化的抵抗”,与他倡导的“人的文学”思想本身存在的固有弱点之间的联系,这些问题尚存在许多有待深化的阐释空间,需要作者去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在中国,在日本,作者对于原始资料的搜寻,下过很多功夫。书里运用了很多自己翻阅的民国原始期刊、原版译著,还直接阅读了一些日文书籍和刊物资料,将获得的新鲜资料吸收进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纠正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日文翻译著作中的某些错讹。作者力求遵循如他所期望的“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并对这些历史事实发生的确切状况加以复现”这一科学研究坚实的历史主义原则与方法,在对大量原始史料、文学作品和理论翻译著述搜阅筛选阅读的基础上,凝思锤炼,归纳提升,抽象

推演,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即使毕业论文早经答辩通过,部分章节已见诸报刊,仍然不急于匆匆交付出版,而是历经多年,重新结构,调整充实,反复修磨,最后才收获了这一份有新见颇厚重的学术果实。当今教育评审体制与学术风气下,学术论文著作盛行批量生产,量多质薄的时风中,“史”与“论”关系仍存纷议的氛围下,作者送出的这份成果,或可能多少给我们一些学术观点讨论之外的另一番有益的思索。

六年前论文答辩评阅时,我曾在准备的意见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近二十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有几个重要的趋向,值得我们警觉和反思。尤以三个方面更为普遍。第一,是玄学化的倾向。在深入挖掘作家作品和其精神思想内涵时,完全脱离实际情况地进行玄而又玄的阐释,注入了强烈的主观解读的色彩(被称为‘本体研究向主体性研究转变’),使研究对象及其一些问题,被置于一种如在五里雾中的非常玄妙的难懂境地。第二,是拔高化的倾向。或是出于创新欲望的驱使,或是对于过去思想压抑的一种反拨,或处于对于研究对象及问题真诚的认同,研究者往往想尽办法,脱离对象的实际,拼命拔高,进行一种新的学术上的造山或造神活动。当文学文本自身受到局限的时候,就在思想史、哲学史、心灵史等方面无限制的拔高,将一些文学家的思想哲学与理论家的思想哲学混同起来,如在一个小山包上造出一个个高大的山峰来。第三,是功利化的倾向。现代文学作家,包括鲁迅在内,被某些研究者当作一种借之发言的工具,以实用主义态度代替科学研究,重要的历史文学现象只成了一种可以任意解释的符号,用他来传达的不是基于历史背景的科学认知,而是在这个研究描绘中承载对于现实的抗争或批判。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变成了以当代批判需要来抽象符号式地塑造现代文

学的历史”。这篇论文,我当时认为就有某些“拔高化的倾向”存在。经过作者几年的沉思历练和修改删削之后,本书里的这方面的痕迹,已经变得很少很少了。如对于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有没有建构起一个“现代中国完整的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体系”这样一类的认知和论断,已经被丰富史料叙述构成的更为实在的论说所代替。摆脱一种流行风气的影响,摆脱一些青年气息的浸润,让学术研究多一点历史研究本身给予的约束,多一点由厚重原始史料归纳演绎所构建的坚硬平实,是读这本书之后,在学术作风方面,给我带来的另一种新鲜的感觉。

历史性的学术研究当然也是有生命的。论著里这一研究课题,它所呼唤的声音,就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和未来。作为一个读者,我很高兴读到论著中那些过去虽然阅悉却未置于自己思考系统中进行品酌的历史资料蕴藏的独特闪光。它会以智慧的历史结晶带你走进严峻的现实思考。这本书里作者有些论述与引用,给我提供了理性思索的窗口,也提供了情感冲击的满足。使我感到,一些熟悉资料重被阐释发现之后带来的新鲜刺激,比那些完全陌生资料所能给予我的,可能更多一些亲切的内心激荡和回响。

这里且做一点抄书匠的工作:意在将别人的花朵,摘下来送给喜欢它的人们。比如,我读到1920年8月27日周作人的《〈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其中全文引用了英国人斐尔(Marian Fell)1916年写的对柯罗连珂的评论。斐尔文章最后概括了柯罗连珂的思想,即他的新理想主义观中对理想的认识,然后说:

但是无论庄重或愉快,喜悦或悲哀,科罗连珂在他对于世界的观察上,总是一个乐天家。即使经了艰难忧愁不幸,他小说中的穷苦质朴的英雄都回头向着光明。著者的亲切的心不

绝的在那里寻求各人里面的“永久的人性”。他很深的表同情于人类的不可遏的求自由与公道的愿望,因为有这个,才能无畏的与“恶”相对面。他自己在一封信里,曾对朋友说:“宇宙并不是偶然的各实力的游戏。决定论,进化论与其它学说,都使人承认那里有一个定律,牵引我们向着一件事物;这事物,在他一切的表现上,我们称他作‘善’,就是说向着和爱,真理,正直,与公道。”这便是科罗连珂的装在他一切著作里,对于世界的使命与主旨。

又如,周作人在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的他所译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之小说》一文谈及《二我》这篇小说,该文作者 W. B. Trites 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抹布”主题:

我今论陀思妥也夫斯基,止从一方面着手,就是所谓抹布的方面。要知道此句意思,先须介绍其小说《二我》(Dvojník)中之一节。

戈略特庚(Goljadkin)断不肯受人侮辱,被人蹈在脚下,同抹布一样。但是倘若有人要将他当作抹布,却亦不难做到,而且并无危险,(此事他时常自己承认),他那时就变成抹布。他已经不是戈略特庚,变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却又非平常抹布,乃是有感情,通灵性的抹布。他那湿漉漉的褶皱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抹布虽是抹布,那灵妙的感情,却依然与人无异。

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出的悲痛声音……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塘

里,悲叹他们的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叹,倘尔我因不意的灾难,同他们到一样堕落的时候。

陀氏专写下等堕落人的灵魂。此是陀氏著作的精义,又是他唯一的能事……陀氏能描出堕落人物,他们也有灵魂。其中还时时露出美与光明……《罪与罚》一部小说,就是申明上文所说陀氏精义的书……使《罪与罚》不朽者,止在书中谋财害命的犯人表示他灵魂,给我们看。他的灵魂……又正同我的,或你的灵魂一样……陀氏能够令读者发起一种思想,觉得书中人物、与我们同是一样的人……他写出一个人物,无论如何堕落,如何无耻,但总能令读者看了叹道,“他是我的兄弟。”

在周作人等作家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于着力表现堕落者时,往往在“湿漉漉的抹布生活”中寻找出了“永久的人性”,在堕落的灵魂里“还时时露出美与光明”。这不只是全部俄国人民,也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

整整过去一个世纪多了。今天我们重读许多先驱者们这些深深关注“人”的命运与灵魂的文字,重读这一个令人灵魂震撼的比喻中给予人们对于“人”的沉重思考,伟大作家努力在“湿漉漉的抹布生活”中寻找出“永久的人性”的永久性的启迪,不是还会继续在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灵魂中像金子一样的闪光吗?

作这些靡繁的引述,意在传达一个微弱的声音:经历过长期人性扭曲痛苦磨难的现代中国人,为着寻找或恢复“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辉,为着不少至今还过着或接近过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者的灵魂,为着“和爱,真理,正直,与公道”的理想实现,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的彩虹,这样的时候里,这样的心境下,重

温这一似已古老远去的话题,咀嚼它所蕴有的文学史的与人类生命史的意义,不是仍然值得我们去苦苦的叩问和沉思吗?

拉拉杂杂,说了这些,算是序。

孙玉石

2009年8月15日

于京郊蓝旗营

序 二

张先飞的博士学位论文《“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即将由人民出版社付梓,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先飞的学术起步是在河南大学,他于1994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选题是《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五四”前后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选定这一题目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由于周作人与河南大学有着极深的学术渊源,当年任访秋先生就是周作人在北大的入室弟子,任先生的研究受到周作人的深刻影响。其二,先飞的学术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挑战有难度的课题,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数年后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评选的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就证明了他当年的选择与努力是有意義的。2000年,已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他,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拜郭志刚先生为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在郭先生的悉心教诲下,先飞又将研究领域由周作人扩大到对“五四”新文学西方渊源的整体探究,并将论题定为“五四”新文学现代人道主义观研究。这一课题应该说是颇具难度的,目前研究还较为缺乏,因此选定该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显示了先飞的学术勇气及学术积累。2003年博士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推进研究工作,先飞又分别跟从吴福辉研究员、尾崎文昭教授在河南大

学、东京大学进行了四年的博士后研究,经过近十年的潜心钻研,他对这一课题的思考逐渐成熟起来,相关成果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因此今年才最终将多年的研究成果奉于学术界面前。

下面我想就先飞这部论著的主要特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新文学渊源的研究。河南大学的新文学渊源研究是任访秋先生所开创的重要研究方向,说到新文学的渊源,自然就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渊源;另一个就是西方渊源,任访秋先生是两者并重的,这也成为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关于西方渊源的研究,先飞正是在任访秋、解志熙等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自己思考的,他在这部著作中,抽出“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观的几个核心命题,新理想主义、现代人道主义观、“人间”观、现代“灵肉一元观”等进行研究,对于每种近代观念,都是首先追寻其在西方的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再将“五四”新文学家们的思考置于这一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当中,作出准确定位,寻找“五四”文学发生、发展的渊源。应该说,这几个特殊命题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及。正因为这些学术难题未得到较好解决,因此影响到对新文学渊源的深入研究,如新文学发生的具体精神背景,新文学发生的“人学”观念基础等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这些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开展的阻碍。基于对学术的热爱,先飞选择了这些学术难题,显现出他的学术判断与自信。他积十年之功,得益于多位国内外专家指导的这一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文学西方渊源研究的一种积极探索,也是对新文学研究的推进。此外,在作出具体研究的同时,先飞还对新文学西方渊源研究进行了方法论探讨,并对这一方面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特别强调对历史发生时段内理论解释系统的复现,以此作为分析历史文本的主要理论工具,将其与对原始资料的精细考证、梳

理有机融和,实现对历史的较为客观的复原。

其次是关于“五四”文学人道主义的研究。“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但很多研究者仍停留在直接搬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时期的西方人道主义观念,来说明“五四”人道主义的观念属性,猜想推断之言居多,而实证研究较少,并且这些研究对所凭依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也很少真正下功夫去了解。先飞的“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源流研究试图改变这一研究方式,立足实证研究,从19世纪中期以来浩繁的中西文献梳理当中,寻找出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潮流脉,并对“五四”新文学家们对于现代人道主义的思考及理论创造进行了深入剖析。因为有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作支撑,所以他的“五四”文学人道主义研究的每一个结论,都言之有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我个人觉得,先飞的研究,对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研究及主题研究也有着重要推进。

第三是关于“五四”文学及周作人的思想研究。先飞的研究工作一直偏向于思想研究,而且思考焦点往往集中于“五四”文学与周作人。他之所以选择思想研究完全是因其所长,先飞对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等有着较深厚的积累,十分注意世界各种哲学思潮,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长于理论思辨,视野较为开阔,这些基本素养与学术积累,促使他敢于选择一条艰辛的路,对“五四”文学、思想进行话语清理。不过他的思想研究与现在很多研究者相比有着很大差异,他对史料的收集、考证等工作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很明显是受到任访秋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也从日本文史学界获得了颇多启示。这些年在“五四”文学与周作人思想研究方面,

扎实的研究少了,借题发挥的多了,而且在史料的收集、运用、整理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虽然出现了很多看似精彩、深刻的议论,却往往令人难以信服,相形之下,先飞的研究看似笨拙了一些,但这正是他的一种坚持,实际上是对学术尊严的坚守。

关于“五四”文学研究,先飞有着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历史认知,即认为“五四”新思想与新文学是20世纪初新理想主义世界思潮的一部,他将此作为切入“五四”文学的重要视角,应该说是重要的理论发现。除此以外,他对新文学的核心主题灵肉关系的历史源流的梳理,也令人耳目一新,相信会对新文学研究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关于周作人研究,先飞在作家思想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他对作家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他对现行研究中的一些通行做法,即利用作家不同时期的相似观点总结出作家思想主线的研究方式始终持反对态度,认为这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的这一清醒认识,相信对很多年轻学子的研究会有很好的警示作用。还必须强调的是,先飞的周作人研究,完全是为了更深入地挖掘“五四”文学思潮的深度,并非为周作人个人树碑立传,他继承了任访秋先生对周作人的基本判断:既充分肯定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重要建树,但对其为民族所不齿的附逆行为,亦作出坚决的否定与批判。

第四是关于史料的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重要性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直到21世纪后才逐渐成为共识。先飞在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京大学都受到过严格的实证训练,他扎实的史料功夫正是这种学术训练的结果,而且近年来河南大学顺应学科发展的潮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先飞对于史料学问题的学术思考也明显受到这种学术潮流及师友思考的深刻影响。